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以“公私合作”缓解“土地财政”依赖

在一个论坛上，财政部一位领导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目前城市建设资金主要靠转让土地的收入支撑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何谓“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主要是财政部力推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该模式正在全国多个省市推进。所谓PPP，是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具体项目的合作融资模式，适用于具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PPP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伙伴关系，二是利益共享，三是风险共担。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财政部门专门设立了PPP管理机构，负责推动PPP模式发展，履行研究设计、项目储备、融资支持、招投标管理、争议协调等职责。

看来PPP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可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民营企业更可以在农村新型经营方式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城镇化是当今拉动内需的最主要抓手。各地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都对这一点予以特殊的关注，比如浙江强调要真正落实“非禁即入”原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中心镇、小城镇建设，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等领域，让民间资本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完善公益类经营性项目土地出让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养老和健康服务产业。

这些领域如果政府都去做，可能会无能为力，同时，民营经济也急需扩大经营范围。传统理论认为，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等公共机构来提供的，但是，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如今，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可谓世界潮流，航空、供水等产品随着制度和技术的革新，许多业务就从公共供给中剥离出来，甚至连消防，在有些地方也实行私人供给。

因此，我们要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制度。第一，完善定价制度。政府应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引入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可以为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价提供必要参考。第二，完善政府规制监管体制建设。要建立起完善的行政监管程序以及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要严格界定规制机构的职责范围和行使职权方式。第三，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的私人参与供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政府作为公共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为私人供给者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2014年4月14日《南方都市报》叶青）

服务贸易协定为何常被抗议

服务贸易简称服贸，又称劳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服务贸易正式被囊括在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如今服务贸易的商品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包括传统的商业、金融业、法律服务、会计业、保险业等等，还包括跨境医疗、旅游、通讯、教育、学术研究等社会活动。据WTO统计，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8.5万亿美元，较2011年同比增长约2%，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0%。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总额增长迅猛，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4706亿美元，位于美、德之后，跃居世界第三。除了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也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由此与多国互相开放服务贸易。另外，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也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中涵盖了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下，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2013年9月30日，中国正式宣布参加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一旦加入这一协定，中国将与全球48个已经加入TiSA阵营的国家削减服务业贸易壁垒，互相开放服务业，这必将加速我国服务业腾飞。

然而，服务贸易自由化势必会重新分配缔约方不同服务业的利益，遇到利益团体的阻挠在所难免。通常情况下，发达经济体最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打开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业。例如，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可以借机顺利进入发展中经济体，或是并购发展中经济体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厨师、护士、医生、电工等却无法顺利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市场。这导致每当发达经济体谈及服务贸易开放时，发展中经济体民众总感觉弊大于利。2011年4月7日，哥伦比亚各地150万人在主要城市举行游行，反对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民众的抗议包括反对将教育、卫生、就业和住房私有化，拒绝桑托斯总统的发展计划，认为那是将国家大多数资源交给外国人。

事实上，发达国家间签署服务贸易协定也非易事。2007年，韩国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增加了美国服务业提供商对韩国的出口机会，涉及范围包括银行业、电信以及快递等。但美国国会认为这可能促使银行业、电信业将更多业务外包到韩国，从而减少美国工人就业，故迟迟未对该协定进行投票表决。而数万韩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其中不乏从事教育、医疗、会计师、律师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白领们。他们担心美国名牌大学来韩国开分校，名牌医院、各种事务所来韩国设立分支机构，会抢了他们的饭碗。2011年，当多次修改协商后的协定最终本送交韩国国会表决时，甚至还有人向国会议长席投掷催泪弹以表达不满。但是最后，美韩两国国会还是先后通过了该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该协定正式生效实施。（2014年第14期《中国经济周刊》朱禁弢）

◆文 坛

宋太祖的无字信

宋太祖赵匡胤准备平定南唐，决定任命仁厚的曹彬为主帅，作风剽悍的潘美为副将。曹彬怕潘美等人不听招呼，极力推辞，太祖笑笑说：“我自有安排。”

大军将要出征时，太祖在大内讲武殿设宴为曹彬和其他将领饯行。酒过三巡，曹彬例行公事，请太祖对这次行动给予当面指示。

太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当众交给曹彬，然后说：“你是一员儒将，给你做副将的潘美、曹翰都桀骜难驯，恐怕你难以制服，所以特给你手书一封，凡是有不肯用命的人，你就遥望朕所在的方向，焚香开启它，上面已经写清了处置的方法。”

望着那薄薄的一纸信笺，众将禁不住汗如雨下，那可是悬在头上的一柄尚方宝剑啊，不由都收敛起放纵的心。曹彬则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拜谢之后，安然地把太祖的手谕揣在了怀里。

在曹彬的指挥下，宋军军纪严明，战争进展顺利。可时间一长，有的将士攻城略地，面对触手可及的财宝，禁不住手痒，毕竟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只领一点可怜的薪水，总是有点不平衡。曹彬读得懂那种眼神，他淡然地掏出太祖的信，没等打开，将士们便知难而退了。等到江南城破，后主李煜出降，潘美、曹翰气恨他负隅顽抗，想当众将他绑缚起来，曹彬再次拿出了太祖的信，两个人便退下，不敢再说什么了。

很快，江南就被平定。班师之时，太祖又在讲武殿宴请有功将士。曹彬汇报说：“我等同心协力圆满地完成了皇上交办的任务，全军没有违犯军令的现象发生，请求将圣上您的特敕交回。”

太祖笑着同意了。众人举杯畅饮，同庆胜利。酒喝到高兴处，太祖拿出了那封信，让潘美启封，曹翰宣读，众将围拢过来，环形而立，却见太祖的手谕，不过一张白纸，上面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

大家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凝固，而太祖则轻松地笑着，让大家接着喝酒，“极欢而退”，喝高了，才走了。

这件事，被记载在《建隆遗事》中。宋太祖平定天下，本不想过多杀戮，可在动机与结果之间，还需要方法。一封一字不着的信，看似剑悬头上，不仅为手持它的主帅赋予了一份权力，同时也为自己实施奖罚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一张白纸给予人们的想象，远比有形的宝剑更为锋利。由此看来，赵匡胤能开创大宋一朝，绝不是被部下将黄袍披在身上那样简单。（2014年4月13日《羊城晚报》清风慕竹）

◆纵 横

钱玄同给鲁迅“画像”

民国时期有两种反差相当大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政治黑暗军阀混战，争斗得死去活来；另一种现象是大师云集星光璀璨，高度活跃的学术争鸣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两种现象有时碰撞摩擦火花四溅，干戈拿起来就要见血；有时相互顾及不暇，井水不犯河水，军阀忙着争地盘给大师们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在大师的队伍中有一对关系特殊的人物，那就是鲁迅和钱玄同，他们不但是浙江老乡，而且在日本留学时均为章太炎的学生。俩人回国后，在与反封建复辟的保卫战中共同点颇多，尤其是《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向旧势力猛烈开火的高地，一并成为坚守革命精神毫不妥协的斗士。

在鲁迅从文学青年向革命斗士转向过程中，钱玄同既是参与者又是促进者，从帮助引领到后来形同路人，其史料确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那个时候，鲁迅祭起的是文学革命大旗，钱玄同扬起的是文字革命风帆，一字之差，只是侧重点的差异，实质没有多大区别。两位大师各怀奇才，一度几近旗鼓相当，但后来鲁迅头上的光环太亮，而钱玄同身上的学究气太浓，由此两人的历史命运也就大大不同了。

有意思的是，钱玄同虽然年长而体弱，但却有机会在鲁迅去世后，追忆和略评这位文学革命旗手的功绩及瑕疵。五味杂陈其中，老乡情同学情有之，对其学问的敬佩有之，志不同道不合也有之。娓娓道来的平实语言，多少流露出些许怨气，丝毫没有盖棺定论的“好话大全”，只有切身的感受和理性的点评，大师间的微妙关系跃然纸上。

老乡老同学的片段片语片评，或许不会十分的准确，但钱玄同却有意无意地给鲁迅“画”出一幅最为逼真的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画像”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栩栩如生，更加真实可信。

钱玄同无愧于文章大家，看似笔端的轻描淡写，其实很是灵性的匠心独具，“画”起鲁迅的像不但带着素朴的真诚，而且也是留有几分的谨慎小心。他先从多年与鲁迅交往中那些活生生、真切切的细微情节开始，以事评人，评人说事，事中蕴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觉到评价，生成了有血有肉、有对有错、有褒有贬的“真人实像”。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钱玄同对鲁迅译著的评价是：“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对鲁迅文章的评价是：“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对鲁迅著作的评价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实可佩服”。并对鲁迅在北平女师大“三一八”惨案中站在学生一边给予毫不保留的敬佩。

接着钱玄同讲了一个小故事，不经意地把鲁迅的另一面“描摹”出来。有一次，钱玄同和鲁迅在一个聚会上见面，他看到鲁迅的名片写的是“周豫才”，就打趣地说了一句：“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鲁迅顿时就沉不住气了，愤愤然地答道：“我的名字从来没有改，不像有的人名字两个字、四个字。”如此不友好的话，指向是很具体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名字到底有几个字，而是在说斗气的话，这多少反映出鲁迅的心胸和气量还是有些问题。

钱玄同是个真话直说的人，不太顾及某人是伟大还是平凡。他叙述完这个小故事，然后接着评价了鲁迅的长处，但也不客气地点出了他的不足。钱玄同“画”的鲁迅像，轮廓是清晰的，光彩是照人的，但也粗线条地勾勒出了鲁迅身上的三道疤痕。

第一道疤痕是多疑。鲁迅的性格属于过度敏感型的，对人的多疑、对事的多疑亦是难免。某种程度上，多疑也有好的一面，比如鲁迅对一些事情的高度敏感性，所以能写出敏锐的文章。不应该的是，鲁迅对朋友的多疑，为钱玄同所不认同。

第二道疤痕是轻信。与很多名人一样，鲁迅的轻信在于他喜欢听别人说的好话，从另一个角度说是特别听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哪怕是隐隐约约的一点建议性批评。对同志及朋友的批评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他更需要的是青年崇拜和一呼百应。钱玄同显然看不上鲁迅的这一点。

第三道疤痕是迁怒。鲁迅的性格爱憎分明，斗争的原则性不容置疑，当然迁怒也是出了名的。迁怒无论多么正确，都是感性过旺而理性不足的表现。对坏人恶人也许应该迁怒，但见到不同的观点就迁怒那就有些不对了。钱玄同不赞成鲁迅迁怒的做法，并对其接人待物的迁怒表示反感。

以上确实是鲁迅的三条软肋。钱玄同不但讲了故事，而且还点了穴位，事事有据，句句在理。其中有没有两人的恩恩怨怨呢？当然是有的，大师也是人，但是非大于恩怨，恩怨不会文过饰非。多疑、轻信、迁怒，实在是鲁迅固有的难以克服的个性弱点。假如不是这样，那他就不是鲁迅了。正因为如此，其他人包括钱玄同才无法代替鲁迅，“画像”中也才是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

这里我想挑明的是，评价历史人物坚守真实性最为重要，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真实性尤为重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好人什么都好，坏人什么都坏，伟大的人物没有一根汗毛不是闪光的，过去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这样。好在80多年前，钱玄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鲁迅，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人们不愿意承认钱玄同所认识的鲁迅，某种程度上是神话了鲁迅。

由此联想到，以往对一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所犯的不是同一种毛病吗？病根在于，美化过度和拔高过度，不实事求是，搞实用主义，这能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能够正视先进模范人物也是人的事实，如果能够通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常识，如果能够明白瑕不掩瑜的道理，这种毛病就不会再犯下去了。（2014年第4期《党的生活》任仲然）

◆史海钩沉

左宗棠吏治思想来源

吏治腐败既为晚清王朝衰败不振之表征，又是其衰败不振重要缘由之一。时任封疆大吏和枢府大臣20余年的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颇为突出，远在时流之上。对其惩贪倡廉、赏罚分明、重教育之法，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秉公办事之风，有论者赞誉备至。

心忧天下的儒家吏治思想

清朝中叶以后，吏治腐败已成为了流弊，而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有了一番作为，树起了廉洁自律的风范。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儒家文化构成了其吏治思想的知识系谱。

左家传世的家风影响。左宗棠出生于清贫耕读之家，从其父左观澜算起，上推七代都曾考中秀才，左宗棠家庭也算是农村中少有的“书香门第”。这个家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恪守朝廷功令，接受以朱熹《四书传注》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笃守封建礼法的“忠、孝、节、义”传家；二是“居贫好施”，他们在贫苦生活中，做着慷慨的义举。这两个特点成为左家传世的家风，对左氏影响极其深刻，并在其为官中得以履行和弘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左宗棠又得到了较好的儒家教育，使其具备了继承儒学民本主义优良文化传统的思想土壤，较早地培养起了浓厚的参政意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儒家经邦治国思想理论指导。儒家经邦治国思想还为左宗棠讲求吏治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方面，儒家修身提倡“内圣”“外王”，另一方面，根据儒家观点，稳定政府及社会和谐的首要条件、必要条件是官吏的才能与德行。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得到最佳人才，首要任务是训练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品格，对他们量才任职，并对其行为奖罚分明。地方官在官僚群体中总是占大多数，牧令为亲民之官，理一方之政，大多数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廉与贪、贤与愚，直接关系到百姓之休戚，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关注吏治问题，而追求“官民相得”的政治目标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传统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左宗棠深受该思想的影响，他为官不仅“倡言‘心圣贤之心，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又极重“‘克己’、‘正心’、‘修身’，身体力行”；其治吏重操守、重才能，讲官民相得。

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左宗棠吏治思想影响至深。乾隆末年，姚鼐、刘大槐和方苞创立了桐城学派，他们重视道德教化，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家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而把这派人物称之为“理学经世派”。清末以来，倡导这种风气的湖南当首推王夫之，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无论治宋学者还是治汉学者，都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整顿吏治。鸦片战争前后，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宗旨的经世致用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左宗棠早期科场坎坷，刻苦攻读经世“有用之学”，较长时间担任乡村教师，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爱国人士和文学派有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这些人都担任过清廷的封疆大吏，他们的为官治吏之道，对左氏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在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探讨整饬吏治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的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又最深。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的伯乐。左宗棠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幕府中做幕僚多年，对于吏治有了一些实际的接触和了解，为其后来大刀阔斧进行吏治整饬积累了一些经验。

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影响。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也在影响左宗棠。作为一位重民主义者，左宗棠深悉“民为邦本”的真谛，还在青壮年时期，他就比较注意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清廷吏治腐败早有切肤之痛，感到不限制和约束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压榨和盘剥，势必使当时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严重威胁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为官之后，他每到一地都关心百姓疾苦，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也希望他任用的官吏能做到这一点。考虑到甘肃和贵州两省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困苦，他上书《酌议甘黔并捐分捐省分折》，“黔省瘠苦，饷源枯竭，亦系实在情形”。在实践中，左宗棠对民情民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下的仕途生涯

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不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他的吏治实践活动跟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这一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清朝地方行政建制，一般分为省、道、府、县四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总督的职掌是“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是“掌考察布按诸道及府州县官吏之称职不称职者，以举劾而黜陟之用”等。总督和巡抚通常可以综领一省或数省的行政权、兵权和监察权，府道及府道以下的文武官员可由督抚奏请升降调免，但名单须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核准。地方官员的任用和铨调，以出身和官缺制为基础。地方文职官员的出身分为两大类：一是“正途”，一是“异途”。“正途”包括科举（进士、举人）、国子监“五贡”（恩、拔、副、岁、优）。“异途”，大抵有捐纳、荫叙及胥吏考职等。通常正途出身者受优待。唯正途出身可担任地方官府的正印官。即使是县级佐贰官升任知县之类的正印官，也需督抚等保举和朝廷严格甄选，督抚在道府以下官员的补用方面权力较大。

但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做官的危险性很大，有些官员弃印逃走，新任的官员迟迟不敢到任。官员缺乏，形势紧张，清廷不得不变通成例，授权督抚自行派员管理地方，而不必报告吏部核准。高级官员仍由督抚奏荐，中央审查任命，但中央的审查已流于形式，事实上是每奏必准。此时，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正在发生事实上的转移，地方督抚有了更多、更大的官吏任免权。

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为左宗棠整饬吏治提供了契机。从左宗棠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有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兼管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有了这样的背景和特殊的身份，作为权倾一方的大吏，左宗棠才有了大量筛选人才的机会，否则他整饬吏治的力度是展现不出来的。当深切地感受到必须整饬台湾吏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于是对台湾吏事兵事，未雨绸缪，并上《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时绸缪折》，“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取陋规，以保私利，武营以虧挪为固然，恬不为怪”。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议，使左宗棠的吏治想法在东南地区得以雷厉风行地实施。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特殊环境和身份使得左宗棠对吏治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2014年3月中《人民论坛》刘维民）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